



图文珍藏本

闻一多 情书全集

闻一多

著

闻铭

编注

张瑞霞

整理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闻一多情书全集 : 图文珍藏本 / 闻一多著 ; 闻铭编注 ; 张瑞霞整理. —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23.1

ISBN 978-7-5153-6808-5

I. ①闻… II. ①闻… ②闻… ③张… III. ①闻一多 (1899-1946) — 书信集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2) 第208936号

书 名: 闻一多情书全集 (图文珍藏本)

著 者: 闻一多

编 注: 闻 铭

整 理: 张瑞霞

责任编辑: 张佳莹 庄庸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21号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中心: 010-57350322

营销中心: 010-573503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65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23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2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68.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前言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中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或隐或现……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父亲殉难后，清华大学组建“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整理编定了四卷集《闻一多全集》，于1948年出版。主编朱自清先生在序言中这样精辟地概括了闻一多的生平。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闻一多研究得以顺利开展，有关其著述及生平的资料也搜集得更全。因应形势需要，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在上述《全集》基础上整理扩编成新版十二卷集《全集》，于1993年12月出版。在序言中进一步阐明了闻一多的历史贡献及地位：

“闻一多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是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

的……”“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和提倡新诗格律化理论，他在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和普遍的震动。……后来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时，能够具有那样强大而普遍的影响力、号召力，同样是和他在新诗创作及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分不开的。”

近些年来“闻一多研究”更是取得长足发展，有关的学术研讨及纪念活动不仅在国内，也扩展到了国外。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对闻一多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全面。除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外，艺术家和教育家的形象也日益鲜明。

但在所有这些研究中，少有涉及他的婚姻和爱情，即便有涉及也多系推论或臆造，个别的甚至是歪曲和抹黑。

为什么会出现后面这种状况？原因恐怕只有一个——闻一多的婚姻是包办婚姻。

正如一处气势恢宏、意境深远的胜景，人们在这里看到了巍峨的高山、苍翠的林木，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却寻不见芳草和鲜花，只在风景线后面见到一扇门——掩着的门。许多人流连于山水间，却止步于这扇门前，另些人戴着有色眼镜，臆想着门内的景象，还有的干脆在这扇门上任意涂抹，甚至泼污！

但是，人们不知道，推开这扇门，里面竟是芳草萋萋，鲜花遍野。小径虽有曲折，却曲径通幽，别有洞天！正是这处别有气象的所在，给整处山水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今天这本闻一多情书集，正是要带领人们进入这片洞天，去领略里面别具一格的意境。

父亲集多种才智于一身，他感情热烈奔放，又深沉严谨。在男女情爱上，不仅通过书信，还以诗歌、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来传达。有的艺术形式，如室内设计，现虽已无实物可寻，但从母亲和同时代人的一些回忆中，仍能直观生动地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情意。这里也适当撷取了一些此类忆文。因此，这部情书集不是狭义上的书简，而是广义上的情书。

遗憾的是，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信很多，但绝大部分都被家中老人没收或撕毁了，今天所能搜集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不过，在他给家人的信中，也常附有对妻的知心话，加上这一部分，已足以从中品味到芳草的绿意和鲜花的芳香了。

一、伤茎上的蓓蕾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族名家骅，出生于湖北浠水县下巴河的一个书香世家。据族谱记载，这个家族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一支后裔。文天祥就义后，族人中有一支潜逃至湖北蕲水^①，改文姓为闻。闻家世代相传这段族史，并衷心崇敬一身正气的先祖信国公。父亲自幼便以此来激励自己。

闻家历代重视子孙教育，父亲早年在自传中曾写道：“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貲，筑室曰‘绵葛轩’，延名师傅诸孙

十余名于内。”曾祖父还仿照新学堂给家塾起名为“绵葛轩小学”，不仅教诗云子曰，也教一些国文、历史、博物、修身之类的新编课本。我们的祖父闻廷政（字邦本）是清末秀才，他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家中子弟在辛亥革命前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刊》之类的书刊了。尤其是他能顺应历史潮流，不把儿子们拴在家中守业，而主张送他们出去学习新的文化科学知识，掌握新本领。父亲13岁时，他便为其报考了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

虽然如此，老人仍视封建纲常为天理常规，在家族中不仅固守着“男尊女卑”的旧礼教，而且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坚持由父母做主。父亲幼年时他便为其订下了婚姻大事。

我母亲高真，原名高孝贞（1903年8月26日～1983年11月13日），也出身于大族。先祖在明朝开朝时立有战功，曾受到皇帝亲授的奖赏。这个家族每逢年节都要挂上祖先业绩以激励子孙后代。

外祖父早年就学于京师法政学堂，曾任过知县、垦务局坐办、船舶事务局局长、高等法院推事等职。由于长年在外，见识较广，思想也较开明。他主张女孩进学堂，不缠足，还出资送胞弟去日本留学。在和闻家的交往中，他很早就看中了父亲的聪明才智，决心将女儿许配给他。两家在两个孩子幼年时，就为他们包办下了终身大事。

闻高两家本是亲戚，过往较密。闻家几代婆媳里都有来自高夫人刘氏家族的女子。我的祖母与外祖母就是同堂姐妹^②。父亲幼时还时而去九舅家玩耍，一次还在那里遇见了母亲，这次巧遇给两人都留下了深刻

印象。后来在新婚之夜，父亲还对母亲打趣道：“你那时为什么事要跑走啊？”

1912年，父亲13岁，考入了清华学校。在清华园里，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兴致勃勃地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入校不久他就成了园内的诗人和艺术家。

那个年代正是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期，列强的欺凌和军阀混战使祖国苦难重重。父亲与同时代一些热血青年一样，很早就怀有一种深沉的国士感、宇宙感和人生感。在努力吸取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思考着多难的祖国与个人的关系，悠悠的宇宙与人生的关系。在他青春的欢乐中时时产生“一知半解的少年愁”（闻一多《园内》），一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情绪。他曾满怀豪情壮志，在长诗《提灯会》中高呼：“何当效春雷，高鸣振聋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怀着炽热的爱国热情投入运动，并被选为学生代表团成员之一，六月又作为清华学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联成立大会。

在忧国忧民的同时，他也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妇女的命运，关注着自家姐妹们的生活。对于关系到自己未来的表妹，这种关切自然更加强烈。

1922年父亲毕业留美前夕，接到祖父来信令其回乡与表妹完婚。对于这桩婚事，他最初是痛苦抵制的。他成长于五四时代，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向往的是自由恋爱。他虽和表妹不完全陌生，也一直关心她的成长，但二人毕竟是生疏的，就像隔着一道漫漫长河，河对岸是一片

迷蒙。

但他最终接受了这门婚事！这其中虽有孝道的成分，却并不像某些评论所说，是一种妥协和怯懦的表现。恰恰相反，这里正体现出一种博大的爱！

在家族中，祖父虽有某些开明之处，但仍是一位封建礼教的卫道者，家中女性永远处于卑下地位。在这种道德规范下，父亲的几个姐妹境遇都十分凄惨。父亲自幼就对男尊女卑的现象深恶痛绝，为家中姐妹们的悲惨遭遇鸣不平。如今他不想表妹也步她们的后尘。正如他在《红烛》一诗中所写：“红烛啊！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这种心态是促使他接受这门婚事的一个主要因素。

出于这种大爱，他虽心怀隐痛，但没有像同时代某些文人那样，消极接受、冷淡对待；而是主动关爱，帮助对方提高文化修养，开阔其心灵境界，“凭着希望造出了希望”（闻一多《园内》）。

父亲自幼喜爱绘画，是一个执着的艺术追求者。对于自己这门婚事，他也要借艺术的“魔力”，为生活注入“快乐与同情”，化解忧烦与愁苦。在婚礼前好多天，他就和堂弟闻钧天一起动手装饰洞房。他们在新打的红漆家具上精心绘上金色图案，用绝妙的色彩、古丽和谐的图案将洞房打造成了一个清逸高雅的“艺术宫”！这间“宫殿”不仅成为新郎自己化解愁苦与忧烦、获得快乐与同情的地方，也成为陶冶新娘清纯心灵的佳境，它还成了弟妹和小侄子们的“学堂”和乐园。

在这个“艺术宫”里，蜜月期间他不仅完成了《律诗的研究》一文，

还尽量抽时间为妻子和两个妹妹讲读唐诗、宋词，开启了“诗化家庭”的工程。而“诗化家庭”从此也就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一项工程，一种心灵美的享受。

母亲幼时进过女子职业学校，初步学习过一些科学文化知识。但由于外祖父长年在外任职，家中主要由抱守封建传统的曾外祖父做主，入校不久，就被迫中断了学业，只能在家中接受“闺门教育”。唐诗虽学过一些，也只是死板地背诵。她自幼聪慧好学，渴求提高。蜜月间随丈夫进入诗国，在诗境中流连，是她最感幸福的美好时光了。直到晚年，她还能背诵当年学过的唐诗呢。

这种心灵上的关爱，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投合，在双方心间渐渐滋生出丝丝情意，培育出了爱的萌芽。正如父亲后来在《红豆》一诗中所写：

他们削破了我的皮肉，
冒着险将伊的枝儿
强蛮地插在我的茎上。
如今我虽带着癍肿的疤痕，
却开出从来没有开过的花儿了。

父亲留美前夕，还恋恋不舍地和母亲约定：“隔一两天你就得给我来一封信啊！”

二、继续诗画情

1922年8月，父亲抵达美国。他先后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学院美术系和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学习，均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美国，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男女平等的社会状况，特别是一些先进妇女的突出成就令他惊叹，他更加同情在封建宗法制下呻吟的中国妇女。他在家信中不断鼓励妻和两个妹妹，要以西方妇女为榜样，努力提高自己，改变现状。（见下篇信1、信4）

美国虽有先进的一面，但那铜筋铁骨机械后面的冷酷与罪恶，尤其是对华人的冷漠歧视，却令他悲愤交加。他在家信中痛诉道：“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见下篇信1）数月后，他在另一封家信中又气愤地说：“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

满怀这样的心情，他写下了多首感人心魄的爱国思乡诗，如名篇《太阳吟》《忆菊》等。

也是在这样的的心境下，他倍加思念家乡的亲人，思念新婚的妻子，写下了长篇情诗《红豆》。

长诗写于1922年寒假，这是他出国留学的第一个长假。“独在异

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全诗就是在这种深切的思念中写就的。也可以说，它是一封深切而苦涩的情书。

诗中充分表达了“鞭丝抽拢的伙伴”的苦辣。既写出了在传统礼教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又充满了对封建制度的无比愤慨；既倾吐了包办婚姻带来的苦楚，又赞美了灵魂纯洁的年轻妻子；既为面前“铅灰色的天宇”而悲凉，又充满了甜蜜回忆和美好憧憬。而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痛苦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思念和真挚的情意。这“情”虽带有浪漫色彩，爱人也被理想化了，但它所表达的是诗人真实的情思、实实在在的感受；是从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情绪”，而不是虚空的幻想。

长诗写成后，父亲动情地写信告诉母亲：“《红豆》是为你写的。印出来后，你要是不懂，就叫他们讲给你听。”那一刻，他的心情正如诗中所倾吐的一般：

我把这些诗寄给你了，
 这些字你若不全认识，
 那也不要紧。
 你可以用手指
 轻轻摩着他们，
 像医生按着病人的脉，
 你许可以试出
 他们紧张地跳着，

同你心跳底节奏一般。

红豆的寓意母亲心中自然十分明白，哪里需要别人给讲？！读信的一刻，她的心就已经在“紧张地跳着”了。

现在有的评论认为，这首诗是“从痛苦中寻找出东西来抚摸”，是诗人在自我安慰。这自然是对诗人内心的主观推断和曲解。

1923年9月，父亲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红烛》，其中大部分都是留美后的作品，诗集真实地抒发了一个五四青年的爱国思乡之情和对人生的思考。序诗《红烛》更托出了一颗炽热的心：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

这颗为了祖国、为了世人燃烧自我的心，也是他一生都在实践的誓言。

诗集在当时国内新诗普遍过于平实、直露的状况下，显示了对诗美的艺术追求及创造性，体现出作者“自然的不都是美的”“没有选择就

没有艺术”的理论主张，这在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③

父亲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说：“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出于这样的爱，他在绘画、作诗的同时，仍一往情深地钻研中国古代文学。到美不久，所做笔记就已“蝇头细字，累尺盈寸矣”。这也使他进一步领略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启发他深入思考中西文化的特质异同。

也是出于这种爱，1925年，当他在纽约结识了张家铸、赵太侔、熊佛西、余上沅几位学习戏剧、舞美的青年后，不禁戏兴复萌，和他们一起投入戏剧活动，为创造一种融合中西的国剧而废寝忘食。

忙戏的同时，诗人自然不会忘情诗歌。他对熊佛西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时期写的诗，如《醒呀》《洗衣歌》《南海之神——中山先生颂》《七子之歌》等，都充满了这种强烈的爱国感情。

1925年春末，在留学期满三年时，父亲决定提前回国^④。异国民族歧视的屈辱，留学生活的精神苦楚，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那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都使他无法再羁留。5月，他终于踏上了归途。

父亲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踏上归程，不想刚入国门，就遇上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他满腔悲愤，在家乡小住时日，便匆匆来到北京，并立刻发表了《醒呀》《七子之歌》等诗作。

在首先发表的《醒呀》一诗的跋文中，他写道：“这些是历年旅外因受帝国主义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

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

这些诗当即引起了不小反响，有的青年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固未有如是之感动也。”^⑤

这首《七子之歌》的首章，在半个多世纪后澳门回归祖国时，还唱响了中国大陆，之后更随着中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升入太空，永远回荡在浩瀚的天宇之中！

在北京，父亲结识了徐志摩，二人一见如故。在徐的介绍下，他加入了“新月社”，不久又受聘于北平艺专。

工作确定后，他立即将母亲接了出来。离开老家封建规范的约束，二人都觉轻松愉快。父亲这时兴致很高，在西京畿道住时，更尽施了他的艺术才能。

他将客厅和书房全裱成黑色，上面镶上一道金边。金边是由一连串武梁祠画像中的车马人物图形构成。顶棚上垂吊着反射灯，灯光朝上洒向四方，柔和而均匀，“夜间黑影与灯光交斗，幻出种种不成形的怪相”，这别具意味的黑屋子当即成了一群新诗人聚会的乐窝。徐志摩在生动地描述它那特殊情调之后写道：“这是一多手造的阿房，确是一个别有气象的所在，不比我们单知道买花样纸糊墙，买花席子铺地，买洋式木器填屋子的乡蠢。”^⑥

而黑屋子的套间，更是一处别有气象的所在，它与黑屋子显然是一个完整的布局。这里是父亲与母亲的卧室，与黑屋子色调完全不同，它

通体裱成了粉红色，窗台上还点缀着瓶花。他在《色彩》一诗中曾写道：“粉红赐我以希望。”这里不仅体现着温馨的爱情，更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在这里，他亲自为妻设计服装，选择色彩，特别欣赏她穿绿色服装。为此，他竟不厌其烦，亲自动手将她的一件旧式绿袄下摆的两个角修剪成圆形。向来不爱逛街的他，还亲自跑上街去为她选购了一件镶有绿边的绿色旗袍。这件夹袍，我小时候在昆明还见过呢。绿色的面，绿色的里，绿色的镶边，连纽扣也是绿色的。这些绿却层次各不相同，锦面是翠绿的，上面镶有银白色的小花朵，滚边和纽扣是墨绿的，绸里则是淡绿的。望上去，整件衣裳宛如一片明媚的春光。那银白色的花瓣，就像春天里叶片上闪烁着的粼粼阳光。想当年，母亲穿上它，在他们温暖的小洞天里，正像满园春色捧出的一枝新绿！而当她穿着它往黑屋子里送去茶水时，真宛如一阵清新的春风。细心敏感的徐志摩在谈到闻一多的家时不禁发出这样的赞叹：“有意识的安排，不论是一间屋，一身衣服，一瓶花，就有一种激发想象的暗示，就有一种特具的引力，难怪一多家里见天有那些诗人去团聚——我羡慕他！”^⑦

西京畿道34号的诗情画意不仅赋予诗人们一种特殊的美的享受，还深深陶冶着女主人的心灵。母亲是爱美的，不仅衣装追求雅致，就连笔记本里也夹着各式花朵和美丽的叶片。现在这种人在诗画中的意境，更提高了她的审美水平，也提升着她的生活境界。

那个年代，列强横行，军阀混战，政局十分动荡。父亲在自己的“乐窝”中居住不久，奉系军阀吴佩孚攻入北京，他不得不和许多文人一样，

南下避乱。

也就在这时，爱女立瑛病重离世，爱妻也因过度伤痛病倒。他满怀伤痛，但为了谋职，不得不只身来到上海，开始了漂泊的生活。

他心情极度郁闷，家事伤痛，国事又令人忧愤，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北洋政府的残暴统治，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国民革命兴起又分裂，国共合作转眼又变成血腥的清共大屠杀，这一切都使他痛心、忧愤，也使他迷茫、困惑。心中如花的祖国究竟在哪里？哪里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感情深沉、撼人心魄的诗作，如《心跳》《发现》《一个观念》《一句话》等等，充分反映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苦闷矛盾的心绪。

在《发现》中，他迸着血泪呼喊：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1928年8月，父亲应聘为南京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讲授英美诗、戏剧、散文。工作安定后，他立刻将家室接了过来。经历了漂泊的生活，他异常珍惜眼前的团聚。《回来》一诗充分反映了他这时对妻、对家的深情。

这一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诗集《死水》。这是他的代表作，内容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反映了对祖国深沉的爱及对现实丑恶黑暗的激愤与苦闷。贯穿其中的仍然是那颗赤诚的爱国心。在艺术风格上较之《红烛》也已完全圆熟。

《死水》的封面及环衬都是父亲亲自设计的，它“体现了一个完整的构思，黑与红、静与动、简与繁的对比启发人们的联想，像《死水》的诗一样，含蓄深沉，境界很高，意境很深”^⑧。

《死水》诗集的出版，连同《红烛》诗集以及闻一多的整个新诗理论是他对现代新诗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笃深鸿雁情

1928年7月，父亲应邀来到武汉大学任教并兼任文学院院长。此